

视觉文化时代的别样言说

——探析严歌苓小说的影视改编热

宋琦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近几年的文坛中出现了一种严歌苓热的文学现象,从普通民众到专家学者,严歌苓的小说都被予以高度关注。严歌苓的代表作品很多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同时她也成为了小说作品被改编为影视最多的作家之一。本文将结合她的小说文本,分析其小说的独特魅力及其所包含的影视特征,进而阐述严歌苓小说能引发影视改编热的原因及其带来的文学思考。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魅力;影视特征;文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I207.42;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3-0040-03

电影与电视无疑是20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传播技术、最具潜力的传媒产业、最流行的视听综合艺术,同时,电影和电视在本质上又是最具有世俗性的艺术。电视剧更是以其故事性和视觉性对普通民众的情感释放、焦虑缓解、休闲消遣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影视以更为便捷和迅速的方式实现着对文学书写的艺术转换。如果说影视是梦幻的制造厂,那么,文学写作就是原料的供应商。随着视觉文化时代影视艺术与文学书写的不断结合,“触电”已日益成为一个作家被文坛认可、被大众接受的途径和标志。女作家严歌苓就是其中成就极其显著的一位。

一、严歌苓小说影视改编热的原因

文学与影视的联姻缔造出了好莱坞的第一华裔女编剧。那么,为什么严歌苓的众多文学作品能得到导演的青睐,改编为影视剧,并引发收视热潮,大受观众喜爱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严歌苓小说独特的文本魅力;二是其小说文本中所蕴含的鲜明的影视化特征。

(一)严歌苓小说独特的文本魅力

阅读严歌苓的小说,不难发现她是一个极会讲故事的人。她的小说题材内容广泛,人性思考和女性体验贯穿始终,并通过通俗化的大众叙事向读者娓娓道来。作家出国前的作品主要以军旅故事、知青故事为题材,代表作品有《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这些作品集中叙述了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特殊历史,从部队生活和知青生活的叙述中体现作家独特的女性情感和生命体验。移民美国后的创作以移民题材为主,主要代表作有《扶桑》、《少女小渔》、《人寰》等,这些作品以思考东西方文化碰撞所造成的文化、性别冲突为主,展现

复杂的人性。旅居非洲后,她的创作转为纯粹的“回归”题材、“中国书写”,主要代表作是《天浴》、《白蛇》、《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这些作品是严歌苓在经历了移民思考体验后,回望故土——中国大陆,以冷静睿智的叙事心态审视民族历史、剖析自我、挖掘人性,进一步拷问灵魂,升华生命意义的力作。

小说是文学创作的基本体裁,以情节叙述和人物刻画为主要特征。大部分的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更看重小说的故事性,而严歌苓恰是讲故事的能手,她的小说有曲折丰富的故事情节,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尤其是那些传奇的女性形象更能吸引读者。严歌苓曾说:“到了一块新的国土,接触到的,看到的,都是新鲜的,因为空间、时间及文化语言的差异,或者说是距离,许多过去的往事也显得奇异,获得一种反思的意义。”^[1]《小姨多鹤》就是严歌苓回望大陆故土,反思历史的作品。故事发生在战争年代,一九四五年秋,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日本国居住在黑龙江的开拓团的民众以集体自杀报效天皇,不愿自杀的民众企图结伙逃难,想取道辽东大连登船回日本。小说的主人公是十六岁的竹内多鹤,她凭借自己的机智和求生的本能,躲过了苏联大兵、中国兵团和土匪的无数次袭击,努力生存下来但却沦为了孤儿。之后,多鹤被卖进一个因儿媳不育而有绝户之危的东北人家,为其充当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多鹤的丈夫张俭为了掩饰一夫多妻和借腹生子的真相,在接下来数十年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中,他带着原配妻子朱小环和多鹤背井离乡,辗转奔波,与此同时,上演了一幕幕与同乡、同事、邻里之间斗智斗勇的精彩故事。

多鹤经历了4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历史的“混

收稿日期:2013-06-06

作者简介:宋琦(1987-),女,山西阳泉人,延安大学文学院201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乱和轻浮”,经历了政治历史的驳杂和变幻莫测,同时更感受到了政治风云下社会的残酷。多鹤作为一名日本女子,是中华民族刻骨仇恨的民族中的一员,她的存在就是张家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她虽是丫头、大孩、二孩的亲妈,却只能当孩子们的小姨,故称“小姨多鹤”。多鹤始终生活在一个尴尬的社会、家庭环境里,默默承担着畸形家庭的重担,然而在社会波动的危难中,她以坚韧的力量拯救家庭,这种宽容、善良、天真的人性超越了民族的界限,使多鹤最终赢得了家里每个人的爱。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西蒙·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指出:“一个女人之所以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1]严歌苓善于书写复杂的大历史背景下,在夹缝中生存的女性形象。《小姨多鹤》中除多鹤之外,另一个出彩的传奇女性,恐怕就是朱小环了。朱小环是张俭的结发妻子,由于日本人的袭击追杀而导致流产不能再生育。在这个畸形的家庭中,在外人看来,朱小环是张俭堂堂正正的妻子,是三个孩子理所当然的妈,而实际上她与三个孩子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无论是丫头考上滑翔学校后她激动无比,还是二孩从楼上摔下后她万分紧张,乃至不辞辛苦地缝制衣服,竭尽全力为大孩攒去日本的路费,她所表现出的种种艰辛和执着,都使她更像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可敬可爱的母亲。朱小环在与和自己丈夫生育的日本女人共同生活中,由最初的不能忍受到最后对多鹤的诚心接纳,再到她们之间亲如姐妹,相濡以沫。我们可以看到朱小环身上最宽广的善良,同时她身上最突出的就是她的“凑合哲学”。她稀里糊涂凑合着一大家子的生活,没有面粉就用麸子凑合,没有红烧肉就拿红烧茄子凑合,没有洗头粉就用火碱凑合。在动荡困难的日子中,我们看到了朱小环的机敏和灵活,她的一张利嘴经常能为多鹤解围,粮食短缺时朱小环还“无中生有”地在市场上“打猎”,努力帮家人度过饥饿的难关。朱小环是笑着“凑合”,叹着“凑合”,怨着“凑合”,日子就在“凑合”中平稳有序地过下去了。这种朱小环式的“凑合哲学”将小环这个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坚韧的生存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小环和多鹤两个本应该很不协调的角色,就这样在残酷的历史夹缝中,出于对家人的爱,出于人性中最大的善良和宽容和谐地相处着,并产生了不离不弃的亲情。

在严歌苓的小说中,像多鹤、朱小环这样独特的女性形象还有很多,严歌苓正是以其通俗化大众化叙述历史的风格,塑造出了一大批具有雌性、母

性、宽容、善良、无私的“民间地母”形象,完成了对主流叙事和权威话语的颠覆和超越,赢得了不同年龄的审美受众。由此可见,“严歌苓热”与她独特的小说文本魅力不可分割。

(二)严歌苓小说中的影视特征

严歌苓的小说与影视文化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不仅与她独具特色的小说魅力有关,同时还与她小说中潜在的一系列影视特征,如特写镜头的展示,强烈的色彩感、画面感,蒙太奇结构方法的应用密不可分。

1、特写镜头的展示

著名评论家雷达这样评价严歌苓的作品:“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视觉、听觉和高度的敏感。”^[2]严歌苓巧妙地取电影之长,补小说之短,她的小说里常运用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把文本的情节放大的同时,使情节在不断发展中给读者带来惊心动魄的停顿,这些停顿不仅能感染读者,还能使读者体会到远超出文本的强烈刺激。

小说《扶桑》中有许多特写镜头,扶桑出场时这样写道:“这个款款从喃呢的竹床上站起,穿猩红大缎的就是你了。缎袄上有十斤重的刺绣,绣得最密的部位坚硬冰冷,如铮铮盔甲。”^[3]“你再次转身,现在我看你脑后那个庞大的发髻,一根白玉簪,一串浅红绢纱花从左耳一路插下来,绕半个髻。几年后你的发髻深处将藏着一颗制服铜纽扣,是克里斯的,那个白种少年。”^[4]这些文字将19世纪60年代名噪美国唐人街的华裔妓女扶桑推向读者眼前,一个着装繁琐,发髻漂亮,极富东方古国韵味的绝美女子就是小说的女主角。小说中几处都写到扶桑嗑瓜子的场景:“他(克里斯)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中国女子如扶桑那样嗑瓜子:那样绷紧嘴唇,在瓜子崩裂时眉心轻轻一抖,仿佛碎裂了一个微笑的痛楚;再那样漫不经心又心事满腹地挪动舌头,让鲜红的瓜子壳被嘴唇分娩出来,又在唇边迟疑一会,落进小盘。那样清脆细碎的唇齿动作使她的缄默变成极微妙的一种表达。”^[5]“他(克里斯)不由地转向她。看着。她唇齿的动作和声响使那种细碎的表达出现了。原来她不是只用一种方式嗑瓜子,竟有无数种!一会将瓜子整个填进嘴里,由舌头和牙齿去摸索,一会她只将瓜子拿指尖捏着,用门牙轻轻去咬,这样咬的时候,她的下巴勾进胸口,眼睛变得深起来。她宽绰的衫袖随她的手摆动,浅红底色在袖口镶的黑缎边上,又用许多种不同彩调的红色

绣一圈花。那么多绣上去的花使她的侧影显得极其富丽。”^[7]这些描写透过克里斯的眼睛以放大夸张的特写镜头展现给读者,将小说中一个东方妓女悠闲泰然的细节动作转变为色彩斑斓、活灵活现的动画,唤起读者的全部神经,定格在读者的记忆中。

2、强烈的色彩感、画面感

上文提到的小说《扶桑》中扶桑出场的那一段,就给读者一种视觉记忆感,“腥红大缎”以夺人眼目的色彩给扶桑这一东方名妓定下了古老而迷人的色调。这抹具有东方意味的红色已经被符号化,成为扶桑的身份甚至是人格的确认标签。连扶桑自己都认为:没有红衫子,她的情人——克里斯就很难认出原本的自己。因为“白麻布袍的粗糙和朴素使一种可能性从她身上显露出来,那就是她作为一个极平凡、黯淡(如他母亲一样)的女人的可能性。白麻布给了她一种规范,抹去一切魔一般的东方痕迹。”^[8]“白麻布”和“红绸衫”在各具意味的同时,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只有扶桑重新穿上那破旧的红绸衫,她才会“圆熟、欲滴”,她在克里斯眼里才是真正的复活。小说中抢眼的红色多次出现,被符号化的红色不仅是扶桑神秘迷人的身份象征,更是其母体文化——东方古国文化的象征,扶桑的魅力源于她与生俱来的东方性,这才是严歌苓赋予“红绸衫”的真正意义。

严歌苓善于用有视觉、有听觉的语言展开描述,并通过语言展现场景的画面感。小说《扶桑》中,有对唐人街中国妓院的描写,中国的“窑子”大都门脸相同,“红漆斑驳”的大门,挂着“四个绛罗宫灯”,高档的通常“细致而繁琐”,低廉的也在“粗陋”中透着繁琐,“纸竹子”、“蜡莲花”颜色惨淡,假山“刁钻古怪”,一切装饰都别具东方风格,但也透着迂腐、封建、死气沉沉的意味。妓院中的乐声不堪入耳,扬琴像“敲鞋钉”,二胡似“钝刀拉肉”,在如此场景中妓女们灵巧地嗑着瓜子。这种极具画面感的语言给读者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引领读者思考第一代华人移民的生存状态以及扶桑的生存环境。

3、蒙太奇结构方法的应用

托尔斯泰说:“电影给作者带来了一场革命,电影中的场景瞬息万变,更接近生活,其伟大之处在于识破了运动的奥秘,要改变我们所积累的那种冗长拖沓的写作方式。”^[9]严歌苓将时空转换的蒙太奇结构方法成功应用于小说的情节展示中。还是从小说《扶桑》中看,当克里斯被父亲禁闭在家中时,他与扶桑彼此思念着对方,但严歌苓没有直接写二人的思念情,而是通过几个不同时空的画面相互拼

接来表现:

克里斯这时一手枕在脑后,靠着草垛。草场稀疏的草带微红的尖。他就那样看太阳突突搏动,掉进海里;水鸟从太阳那里向他扑来。他柔声在讲着什么。他生怕自己生疏了你的对话,忘淡这种鸟兽的语言。

在他这样躺在草中时,你用一只铜瓢舀水,淋在身上。你突然慢了动作,举在下巴高度的手有一点晃。水流一条一条、清清楚楚淌过你的身体,水流有那么多想法、意图,淌过你全身,在每一弯处突然改变想法、意图,急转或分歧,你知道你的思念又发作了。

就在克里斯听着意大利帮工拉起小提琴时,你正在戴耳坠,你们在看着不同的东西,眼睛却恰恰碰到一块。^[10]

这种蒙太奇结构方法的应用显然要比直接叙述更为深切,同时还展现出作者广阔的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力。

二、对严歌苓影视热的文学思考

加拿大著名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通过“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断,不仅梳理出媒介的发展历史,还这样阐述:“如果说17世纪从一种视觉和造型的文化退入一种抽象的文字文化的话,今天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似乎正在从一种抽象的书籍文化进入一种高度感性、造型和画像似的文化”,^[11]即视觉文化。当代美国大名鼎鼎的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分析了视觉文化带来的文化变革:“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12]

毋庸置疑,视觉文化的冲击必然给文学书写带来历史性的变革,文学与影视必然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影视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作为两种艺术形式的交往,已经司空见惯,许多优秀的电影、电视剧作品都是从小说改编而来的。上文已经分析了文学与影视联姻下的严歌苓,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发现,当代影视与文学写作的亲缘关系更直观更明显。正如中国第五代电影的代表人物张艺谋说的:“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13]近年来严歌苓影视热的兴起,给我们带来更多有关文学与影视的思考。在当下视觉文化时代,文学与影视的结合,更多表现在二者的互动与呼应上。

首先,影视文化的高度发达驱策着文学书写的

调整,文学在为影视提供着材料的同时,也从影视那里获得艺术创造上的启迪。如严歌苓的小说创作走出了线性叙事的模式,叙事更有画面感,且叙述语言简洁明了,各种电影化手段的运用都表现出了文学书写对影视文化的呼应。

其次,当文学书写与影视文化结合时,文学传播的效力得到了大大提升。曾经一度依赖印刷媒介的文学通过影视扩大了其传播范围,从90年代到当下,将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作品成了持续不衰的“经营”,同时也尽显出影视在传播上的优越,使这些文学作品的传播力度大大超出了它们作为书籍的传播。当然,影视与文学之间是互动影响的,影视传播在一定意义上也带动和刺激了图书的出版。比如随着电视剧《小姨多鹤》的播出,各地广播电视报会刊载剧情简介,电视剧在多个地方卫视的热播又会引起一系列对导演、演员、小说作者的追逐炒作,同时还会刺激图书《小姨多鹤》的再版和销售。在这整个过程中,影视改编使一部作品得到了多次、多层和多面的传播,造成家喻户晓、人人争说的局面,也就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受众群体和影响范围。

当然,影视文化对文学书写的影响和启发,并

不就意味着后者对前者的趋同。影视与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如果文学书写完全趋同于影视艺术,便不仅丧失了文学的独特魅力,而且也不能给影视提供更多的内容和启发;正是由于文学自身独特的语言艺术追求,才给影视带来更多的新素材、新思考,才使影视作品因小说家作品风格的不同而各具特色。

多元视觉文化语境下文学的存在状态及其发展的趋势必然是开放的、多维的、极富建设性的。图像时代对文学作品的图像化,影视文化对文学书写的变革都是不容忽视的。正如严歌苓曾说:“电影只会让你的文字更具色彩,更出画面,更有动感,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一直所努力追求的。这正是我为什么会爱电影,然后跟电影走得很近的原因。我非常喜欢小说里能够有嗅觉,有声响,有色彩,有大量的动作。”^[14]严歌苓的小说语言简练,故事性强,作品充满着对人性的审视与思考,同时具有极强的艺术张力感,影视对其小说的情感深厚、艺术精湛的改编,必能赢得审美大众的青睞。与此同时,严歌苓的小说所引发的影视改编热也是视觉文化时代的产物,值得我们研究探讨。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江少川.走进大洋彼岸的缪斯——严歌苓访谈录[J].华文文学,2006.3.
- [2] 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3.
- [3] 王娟.论严歌苓小说小姨多鹤的影视化倾向[J].安徽文学,2010.11.
- [4][5][6][7][8][10] 严歌苓.扶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49.212.118.144.145.
- [9] 孙晓红.舞文弄影的艺术景致——严歌苓小说创作与电影艺术关系探微[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1.
- [11] [加]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神[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459.
- [12]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154.156.
- [13] 李尔葳.张艺谋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0.11.
- [14] 铅华.严歌苓.在写作中保持高贵[N].中国文化报,2003/7/1(3).

Looking at the Visual Culture Times from a Different Aspect ——Analyzing the vigorous mass screen-adaption of Yan Gelin's Fiction

SONG Q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71600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Yan Gelin's fiction has been under the spotlight, from ordinary people to experts and scholars, and all of them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her fiction. Many of Yan Gelin's representative works are adapted into movies and television. And she has also become one of the writers whose fiction has been adapted for film and television mostly. Combining with her fi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nique charm of her fiction and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characteristics it included, and further elaborates the reasons of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 of Yan Gelin's fiction and the literary thinking it brings.

Key words: Yan Gelin; Charm of the Novel; Film and Television Features; Literary Thinking

(责任编辑:张俊之)